

微观政治哲学研究丛书

衣俊卿 主编

# 年鉴学派 史学范式 研究

张正明◇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观政治哲学研究丛书

衣俊卿 主编

# 年鉴学派 史学范式 研究

张正明◇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年鉴学派史学范式研究 / 张正明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5

(微观政治哲学研究丛书 / 衣俊卿主编)

ISBN 978 - 7 - 81129 - 398 - 2

I. ①年… II. ①张… III. ①史学流派 - 研究 IV.

①D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7765 号

|       |                                   |
|-------|-----------------------------------|
| 书 名   | 年鉴学派史学范式研究                        |
| 著作责任者 | 张正明 著                             |
| 责任编辑  | 李小娟 梁 秋                           |
| 出版发行  |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瑞哲印刷厂                           |
| 开 本   | 787×1092 1/16                     |
| 印 张   | 17                                |
| 字 数   | 220 千                             |
| 版 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 - 7 - 81129 - 398 - 2    |
| 定 价   | 38.00 元                           |

---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自觉地开启 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

衣俊卿

如何能够比较集中地、比较清楚地展示微观政治哲学的初步样态,自觉地开启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微观视域,是我近年来在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文化哲学理论,特别是现代性语境中的日常生活批判等问题研究时,常常思考的问题。<sup>①</sup> 2006年我在第六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上作了题为“论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的大会发言,开始有意识地探讨这一问题,此后又陆续发表了几篇关于这一主题的论文<sup>②</sup>。然而,这些工作还是很初步的,自觉意义上的微观政治哲学尚未露出地平线,要建立相对成熟的微观政治哲学还面临着诸多困难,任重而道远。其中的困难和问题是多方面的。直接的或者表面的困难在于,这一问题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很少有学者自觉地关注或者投身到这一问题的阐发上。

---

① 微观政治哲学是我主持的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近年来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这套丛书是研究中心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第一批比较集中的学术成果。

② 衣俊卿:《日常生活批判与社会科学范式转换》,《光明日报》2006年2月14日;衣俊卿:《论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YI Jun-Qing, On Micro-political Philosophy, In *Diogenes*, February 2009 vol. 56 no. 1, 41-52;衣俊卿:《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文化哲学》,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2期;衣俊卿:《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社会历史现实》,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等。

而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微观政治哲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哲学研究领域,更不是政治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蕴涵于当代哲学社会科学诸多研究领域之中,对当代社会历史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范式或者理论方法论的东西。换言之,微观政治哲学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范式重要的当代转换,与哲学社会科学诸多领域都处于交叉、交融、渗透、内在化等复杂的关系之中,而我们的研究工作不是去新建一个理论研究领域,而是促使当代社会历史理论中已经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包含着的某种趋势性的东西走向自觉,走向整合。

这显然是一个十分困难、十分复杂的理论任务,我们在从当代社会历史理论文献中进行这种理论提炼和理论建构的时候,面临着许多需要回答和澄清的问题,例如,把哲学社会科学不同领域中的一些思想和趋势性变化提炼整合起来,表述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范式,是否具有合理性或合法性?会不会存在某种理论“强迫症”的问题?把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领域的一些共同的或相近的理论趋势用“微观政治哲学”这一范畴来统摄,是否合适?会不会有以偏概全的问题?进而,这种研究是否符合马克思的思想传统?对于社会历史理论微观视域的强调和凸显会不会导致对社会历史理论宏观视域的忽视或削弱,从而导致否定社会历史规律的后果?如此等等。因此,我在丛书的序言中,除了对我们所理解的微观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进行一般的介绍和基本限定外,还尽量对我们近年来在探讨中遇到的一些理论困惑和某些理论质疑作一点有针对性的讨论。<sup>①</sup>当然,无论如何限定和解答,目前的研究肯定是初步的、不

---

①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为了在丛书一开始比较清晰地介绍与微观政治哲学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我这篇比较长的序言并非是一篇完全的“新作”,而是把近几年我的相关论文中的基本观点重新梳理综合而成。为了保持对于微观政治哲学或者微观社会历史理论范式的基本问题前后一贯的阐述,我对自己相关论文中,包括收录到这套丛书中的《现代性的维度》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概括和表述,没有作大的修改,基本上是直接在这里搬用。考虑到一种新的理论形态或者理论范式的建立,大多需要反复的描述、阐发和强调,才能给读者或者研究者留下印象,因此,对于序言中的类似重复,敬请读者理解。

成熟的,因为这一理论研究本身注定是开放性的。

### 一、关于“微观政治哲学”的称谓辨析

从该丛书所收录的三本专著和一套文集,我们不难看出,虽然我们把它们都冠以“微观政治哲学”,但是实际上,它们所涉及的领域不仅包括传统意义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而且还包括哲学、历史学等其他社会历史理论领域。这样概括或者命名的依据是什么,会不会导致以偏概全的理论误差?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微观政治哲学的兴起,首先是当代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研究的重大进展之一。一般说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哲学研究在西方全面复兴并很快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政治哲学研究的热潮,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后,诺奇克等人的自由至上主义、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理论和社群主义等同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正义理论展开了全方位的争论;福柯、德勒兹、加塔利等后现代理论家对于知识权力、欲望政治等问题开展了政治哲学分析;拉克劳、墨菲、雅索普等后马克思主义者通过领导权、社会主义策略、资本主义国家等问题的研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实现了政治哲学转向。这些不同侧面、不同流派的努力,推动了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和发展。

问题不在于如何判定政治哲学当代复兴这一事实,而在于如何把握这一复兴的深层意蕴,如何在当代哲学研究中为政治哲学进行定位。应当说,这样的思考在我国目前的政治哲学研究中相对比较少。关于政治哲学的复兴所带来的转变和当代政治哲学的定位,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有一定的涉猎。例如,有的学者注意到在罗尔斯等人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西方政治哲学主题发生了从“自由”到“正义”的重大变换;有的学者关注到当代政治哲学与伦理学或价值哲学不可分割的联系。也有的学者通过对现代性批判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转向的

分析,概括出从文化批判向政治批判回归的基本理论逻辑。

然而,我认为,上述分析还不足以揭示当代政治哲学的重要性,我们应当在研究范式的层面上把握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深刻意义。首先必须承认西方政治哲学在许多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我们不能强制地把各种政治哲学流派纳入一个统一的模式之中。然而,换一个角度看,我们又必须承认,无论这些政治哲学流派有多大差异,它们当中的确存在着某些不同于传统政治哲学的共同的特征和重要的发展趋势,这些特征和趋势在深层次上以特有的方式折射出我们时代理论和实践的一些重大变化。因此,捕捉这些特征和趋势应当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任务。我认为,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许多流派中正在自觉不自觉地发生着研究范式的转变:从宏观政治哲学向微观政治哲学转变。我们不能断言这是西方政治哲学的唯一发展趋势和基本特征,但可以断定,这肯定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势。对于这一趋势作认真的分析,可以为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开启新的地平线。

对于微观政治哲学的具体内涵,我们需要逐步展开,在这里,可以围绕着权力的类型作一点基本的概括。一般说来,政治哲学是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或政治事物的本质规定性和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基础进行形而上的反思,对政治体制的建构和政治活动的开展进行价值判断,并提供理念基础的哲学反思活动。政治具有丰富的内涵,但它的主要功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不同形式的制度安排调控社会秩序,因此,政治的核心是权力和控制。所谓宏观政治是指国家制度的安排、国家权力的运作等宏观的、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而所谓微观政治是指内在于所有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层面的弥散化的、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在现代性的视域中,宏观政治主要表现为理性化的权力运作和制度安排,而微观政治既包括不同形式的知识权力,也包含自发的文化权力。

当我们把所讨论的问题集中于权力和控制,特别是集中于微观权力问题时,我们的研究就开始在新的层面上拓展和深化:一方面,它使政治哲学研究的理论范式意义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它开始突破传统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阈限,进入社会历史理论的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微观权力的类型稍加分析和分类,问题就会更加清晰。应当说,在不同文明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微观权力的形态和作用都有很大的差异。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微观权力主要表现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各种控制机制,例如,氏族、家庭、家族、宗族、血缘网络、乡里制度、民间组织及与此相适应的家规家法、习俗习惯、礼俗乡约、道德纲常等自发的规范体系。这些控制机制既表现为政治权力,也表现为文化权力。随着人类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在现代社会中,除了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日常生活权力之外,又产生了其他各种类型的微观权力结构,其中最为重要的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宏观的、中心化的理性权力机制向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所有层面的渗透所形成的微观控制机制;二是随着公共领域的扩大、非政府组织的增加、新社会运动的兴起而产生的各种边缘化的微观权力结构。

关于微观权力的这种分析和分类,不仅使我们对当代人类社会的权力和控制问题有了更为丰富的理解,看到当代社会运行的权力机制的新变化,而且使我们的研究从政治哲学进入了其他社会历史理论领域,在研究范式的层面上打通了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上述展示的那样,在微观权力层面上,政治权力、文化权力,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权力开始“合流”,相应地,政治哲学、文化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也呈现出交汇交融的态势。对于当代社会历史条件下权力特征或者政治特征的这种变化,其他一些研究者也已经有所认识。例如,佩里·安德森在《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中就指出:“政治不是一种自我封闭的行为,不能够自行孕育出一个内部的概念体系。



与某一时期一系列被视为政治冲突有关的观念的东西,是因时因地而变化的。时至今日,它已经远远超出了政治科学的范围。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更不要说地理学、生命科学和艺术,在经典定义中都与政治领域有着各自不同的相交点。正式的政治理论虽然远远谈不上消失,但它也只占据一部分领地。”<sup>①</sup>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在高度关注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复兴问题。例如,赵汀阳在自己的新作《每个人的政治》中断言,“政治哲学在今天变得如此重要,几乎成为哲学中最突出同时也是最活跃的部分,以至于成为当下哲学体系中的‘第一哲学’,这一变化可以称为哲学的政治学转向”<sup>②</sup>。

对于上述现象和上述观点,既可以说是对政治领域、政治学领域、政治哲学视域的进一步拓宽和延伸,也可以说是对传统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限度的突破。对此如何评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现象和态势让我们看到开启一种能够真正有效地面对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并且贯通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领域的理论范式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虽然使用或者“借用”了政治哲学的术语,把我们的研究称之为微观政治哲学,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探讨一种重要的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范式。

## 二、传统宏观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范式的局限性

在探讨这一问题时,首先必须加以说明和限定的是,我们只是在相对的、有限的意义上区分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区分社会历史理论的宏观视域和微观视域。实际上,微观权力和宏观权力是相互交织的,同样,绝对排斥微观视域的宏观社会历史理论和绝对排斥宏观视域的微观社会历史理论也是不存在的。我们不能用绝对的、非此即彼的态度来把二者对立

---

① (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第1~2页。

② 赵汀阳:《每个人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起来。在上述限定的基础上,我们必须承认,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社会的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的发达程度、活动机制、相互关系是不同的,相应地,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社会历史理论,并不能确保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合理地、辩证地处理对社会历史现实的微观透视和宏观把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历史理论的确会出现由于无法提炼出社会历史运动的宏观发展趋势和规律而停留于对纷繁杂乱的微观现象进行描述的状态,或者由于把社会历史规律的普遍适用性强调到极端而完全忽略或者否定微观权力的作用机制的问题。因此,当我们今天批评宏观社会历史理论范式及其“宏大叙事”时,并非一般地拒斥或否认对于社会历史现实进行宏观解释的合理性,更不是完全不承认建构宏大叙事和把握历史规律的价值,而只是批判那种完全遮蔽了微观视域,完全忽视了微观权力的社会历史理论范式,我们习惯地称之为传统社会历史理论。<sup>①</sup>

我在这里作一个假定性的判断<sup>②</sup>:今天我们在这里重新关注的微观权力和重新开启的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并不是全新的东西,只是它们在历史演进中,经历了被遗忘、被遮蔽的过程。实际上,在漫长的传统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时代,人类生存和活动的主要寓所和平台是自在自发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礼尚往来的日常生活世界,这个世界,以及那时尚未从日常生活世界中彻底分化出来的政治、经济以及精神生产等非日常生活世界,都主要是由异常丰富的、日常的、微观的文化权力和政治权力编织而成的。与这种社会历史现实的基本状况相适应,那个时代的相对不发达、不够自觉的社会历史理论,也充满了对

---

① 实际上,“传统社会历史理论”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并非代表着前此一切社会历史理论,而是特指受自然科学普遍化和抽象化范式支配的,极端排斥和否认微观权力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宏观社会历史理论。

②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假定性的判断”,并非指这一判断属于没有任何史实和文献根据的臆想,而是说对这一判断的内涵我们在本文中不去展开具体的历史考证和论证。

于微观社会现象的描述和体悟。随着航海时代对地理空间的扩展,及其现代性所逐步开启的世界历史进程,加之近现代自然科学范式的深刻影响,明晰的历史感和自觉的宏大叙事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而微观权力要素和微观历史描述逐步退居次席或者退隐到背景世界之中。我们可以对这一理论转型的后果加以简要的分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审美特性》中曾把日常生活比做一条长河,他认为,科学、艺术等更高的对象化形式都是从这条生活长河中分化出来的。他的学生赫勒在《日常生活》中明确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她认为,如果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然而,与每一个体的生存息息相关,而又无言地孕育和滋养着人类社会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世界,却长期处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野之外,成为人们熟知的但又熟视无睹的背景世界,一种与物换星移、花开日落无异的自然氛围。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是20世纪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许茨、海德格尔、列菲伏尔、哈贝马斯、赫勒等许多理论家从不同层面推动了这一哲学转向。对我国哲学界而言,生活世界的概念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回归生活世界的真实含义以及这一转向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范式转换的重大意义,还远远没有开展出来。

生活世界之被遗忘是在两个层面上完成的:首先,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历史的进展呈现出从日常向非日常的演化趋势,即从原初的、未分化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的日常生活世界中逐步分化出哲学世界、艺术世界、科学世界、政治系统、经济体系等非日常世界。相应地,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重心也由日常向非日常转移。其次,在理性反思的层面上,哲学和历史科学的关注点越来越被非日常世界所吸引。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经历了“自然科学化”的过程,习惯于把自然科学

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世界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各种社会科学体系，人真实地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则被完全从理性的视野中放逐。一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生成了：围绕着在社会历史现实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的宏观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及其宏观的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哲学成为描述普遍精神和绝对理性的纯粹意识哲学，历史学表现为环绕着政权更迭和国家兴亡的宏观史学，政治学表现为以政治权力和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宏观政治学，经济学成为揭示基本经济运动规律的国民经济学，等等。

应当说，这种以追逐普遍性的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理性的反思性本身就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本质特点。在人类历史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时代，对日常的微观的生活现象进行理论抽象，有助于在偶然的、差异的、个别的、多样化的社会现象中把握人类历史运行中的某些规则性和普遍性的机制。但是，当宏观的哲学社会科学把人具体地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完全视做无足轻重的、平庸的日常琐屑而加以蔑视时，当以价值和意义为特征的人的生活世界完全被以必然性和普遍性为特征的自然世界所消解时，这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弊端就充分显现出来。

弊端之一：否定差异性和个体性。李凯尔特曾分析过，自然科学是一种排斥特殊性和个别性，强调同质性和规律性的“普遍化的方法”，而文化科学则是探讨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内涵，强调个别性和差异性的“个别化的历史方法”。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缺陷是用普遍化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和社会现象，从而否认差异性、个别性、主体性和自由。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甚至断言，在精神的普遍性已经大大地加强的时代，“个别性已理所当然地变得无关重要”，而绝对理念的普遍性

要求统治一切。

弊端之二:忽略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对差异性和个体性的否定,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内涵和意义结构的排斥。结果,在这种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不仅生活世界和伦理道德世界的特殊性和个别性被抽象掉,变成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自然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例,而且,从原初的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学世界等非日常世界,也变成没有内在文化规定性和价值约束的机械的、冷冰冰的自然领域,历史成为“无主体的”自在运动。

弊端之三: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强调思维中的具体,即思维中包含“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恩格斯曾断言,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它的研究结论如果没有包括“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我们发现,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特征正是在普遍的知识和原理中抽象掉这些多样性和过程性,从而形成空泛的、大而化之的理论结论。目前,这种抽象化的毛病不仅在哲学研究中而且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普遍存在,例如,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人们开始习惯于不必亲自动手开展“田野工作”,而从现成的原理和结论出发,使用现有的各种思想资料和实证材料,进行逻辑推演或范畴排列。甚至回归生活世界在许多理论研究中也与现实的日常生活的文化意义结构无关,变成一种理论标签和理论口号,变成关于生活世界的基本特征、功能、规律等的抽象概括。关于实践的研究,也往往热衷于争论实践的规定性、功能、要素、形式等理论思辨,而与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实践无关。结果,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的许多原理和结论往往没有明确的“所指”,呈现为“能指的狂欢”。

### 三、当代社会历史理论微观视域的逐步开启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忽略或者遮蔽微观权力要素和微观视域的,传统哲学社会科学的宏观的和抽象的理论范式,在黑格尔的泛理性化的和泛逻辑化的绝对精神的普遍运动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黑格尔的哲学范式显然受到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的支配,他对精神和理论的普遍化的强调和对体系的完整性或者完美性的追求已经走到了极端。他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强调作为科学的体系和科学的认识的真理。按照他对普遍性的重视,在真理的体系中,个人的认识以及个别性的东西,是微不足道的或者没有任何位置的。“在我们现在生活着的这这个时代里,精神的普遍性已经大大地加强,个别性已理所当然地变得无关重要,而且普遍性还在坚持着并要求占有它的整个范围和既成财富,因而精神的全部事业中属于个人活动范围的那一部分,只能是微不足道的。”<sup>①</sup>

也正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这种鲜明的特征和独具的地位,他的哲学构成了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范式的一个重大的拐点。不难发现,黑格尔身后,许多重要的哲学流派和其他理论领域都从不同的侧面批判黑格尔,特别是拒斥他的泛理性化和泛逻辑化的理论体系的宏大叙事和极端思辨化、抽象化的宏观研究范式。从叔本华开始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和由孔德开启的科学主义或者实证主义哲学思潮,从不同侧面批判和超越黑格尔哲学的这种普遍化和抽象化特征,例如,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讨论罗素和摩尔的逻辑实证主义的一章(即该书的第二章),就使用了“叛离黑格尔”的标题<sup>②</sup>。不过,必须指出的是,真正自觉地、深刻地批判传统哲学社会科学的抽象化和思辨性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都深受

---

①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二版,第50页。

② (英)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但是,他们真正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只是巨大的历史感、基于劳动和实践的辩证法和批判的革命的精神,他们对黑格尔哲学的思辨体系和过分抽象化特征,则持彻底批判的态度。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黑格尔本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相当频繁地爆发出革命的怒火,但是总的说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他在体系上所花费的‘艰苦的思维劳动’倒比他在方法上所花费的要多得多。”<sup>①</sup>

因此,如果我们使用今天的学术术语,那么可以断言,虽然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并没有形成自觉的微观政治哲学、微观史学或者微观社会历史理论范式,或者说没有使用微观理论范式之类的术语,但是,马克思的宏观社会历史理论及其所揭示的社会历史规律是建立在关于各种社会现象的丰富的微观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中具有丰富的微观理论思想资源。在这方面,有两点特别能够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理论定位的清醒意识。一是反对理论思辨和抽象化。马克思从自己的哲学生涯伊始,就对思辨哲学范式的体系化特征深恶痛绝,反复强调哲学要以其内在的批判的自我意识冲破体系的束缚,在现实的社会历史中而不是在纯粹的理性王国中开展批判。人们常常引用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的那句“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的断言。马克思在批判德国哲学时多次直指它的思辨意识哲学范式的弊端。“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sup>②</sup>二是反对脱离生活世界的思辨历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把“现实的生活生产”当做历史的基础,反对脱离日常生活的历史观。他们这样批判传统历史观:“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

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sup>①</sup>

因此，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各种文献中，处处可见的都是这种关于现实的人和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和现实的具体的、微观的分析。例如，人的问题、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人的解放一直占据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核心，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们看不到那种对“抽象的”、“理想化的”、“大写的”人的一般呼唤或描绘，而是对各种具体的人及其境遇的描述，例如，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的、非人化的劳动者，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饱受压迫的女工、童工、工人家庭等，他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吃喝住穿等日常生活，以及作为“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的人自身的生产、繁衍、家庭关系等。<sup>②</sup>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所理解的历史的前提是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活条件，“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sup>③</sup>。再如，马克思特别重视具体化的方法论，他在揭示现代社会运动时，并非抽象地推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而是深入劳动、价值、生产、交换、流通、工资、资本、地租、利润、价格、供给、需求、市场等社会经济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我们还可以列举许多类似的分析。这些思想资源，连同马克思学说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对20世纪的人类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此福柯也充分意识到了，例如，他在《知识考古学》中探讨年鉴学派开启的微观历史视角时，明确指出，“今天，历史的这一认识论的变化仍未完成。然而这种变化并不是从昨天才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8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开始,因为我们肯定会把它的最初阶段上溯到马克思”<sup>①</sup>。

当然,必须在这里明确的一点是,虽然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包含着丰富的微观理论思想资源,但是,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并没有强调或者使用微观政治哲学、微观史学或者微观社会历史理论范式,马克思当时所关注的作为历史发展基础的是宏观的社会领域(经济领域)和宏观的权力(政治权力)及其普遍的规律,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规律,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的宏观的发展模式等。这些也刚好构成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叙事和宏观理论范式的基本内涵。我想,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复杂,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分析。首先,每一时代的社会历史现实对于理论研究提出的任务都是不同的,马克思处在人类历史主要由经济、政治等主导领域和宏观权力所左右的时代,他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刚好是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世界性的市场、资本的逻辑、机械化的大生产构成的主宰一切的宏大的经济力量,以致马克思强调“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sup>②</sup>。其次,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和之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社会历史理论的总体倾向是不承认人类历史发展中存在着规律和必然性,因此,马克思在对繁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分析的基础上,有意识地突出人类社会历史的规律性。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此作了说明,他指出,正如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sup>③</sup>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当我们断言马克思学说中没有形成自觉的微观社会历史理论范式时,是针对今天我们的社会历史理论研究忽视微观分析的问题而言的,实际上,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根本就

---

①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